

巴渝民族研究与史料整理

杜 芝 明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摘 要:巴渝民族是巴渝历史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巴人(巴国)及文化、僚人、元明清土司(土家族)等方面,主要涉及民族的源流、治理、思想、文化、地理等内容。巴渝民族跨区域性、史料分散性及主要附于民族传(条目)下等特点决定了史料整理存在跨区域与巴渝地区(渝东南)、综合性与专题性相结合的特点,具体包括:以目录、提要为主的工具书类资料;方志类史料的整理、出版;汇编类史料的整理,包括正史、实录、地理志书、族谱、方志、碑刻等。

关键词:巴渝地区;民族研究;史料整理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5-0066-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508

巴渝,从人类活动起源地之一到“南夷”之地,再到大一统国家体系中的一方之域,域内民族迁徙、融合、发展并在西南民族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史家在史书编撰中单独给以立传,如《华阳国志》《后汉书》的“巴郡南郡蛮”与“板楯蛮”,《新唐书》“南平僚传”,唐宋之羁縻州,《明史》“石砭宣抚司传”“酉阳宣抚司传”等。此外,杂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仍有不少。目前,巴(渝)文化、僚人、土司等某一方面的综论已有一些成果,但巴渝民族整体研究状况及史料整理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故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巴渝与巴渝民族

“巴渝”之称由来已久,司马相如《上林赋》载:“巴渝宋蔡、淮南于遮。”西晋郭璞注:“巴西阆中有渝水,僚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1]128}这里,“巴渝”为郡名与水名(地名)的合称,是一个地域概念,主指僚分布区域。蓝锡麟据“巴渝乐”“巴渝舞”等记载指出:“不难判定,‘巴渝’是一个地域历史概念,它泛指的是先秦巴国、秦汉巴郡辖境所及,中有渝水贯注的广大区域。当今重庆市,即为其间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堪称主体部分。”^{[2]2}

“巴渝”的界定,多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经历了巴蜀文化之“巴”到巴渝文化之“巴渝”的发展历程,其定义呈现细微变化。

20世纪40年代,卫聚贤等学人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学术命题,卫聚贤提到:“林名钧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第五期有罽于图,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

收稿日期:2019-02-22

作者简介:杜芝明(1979—),男,四川荣县人,史学博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史、边疆民族史。

川)慈利(湖南)长阳(湖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等出土,包括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注:《蜀国文化》)为一《巴蜀文化》。”^[3]“巴”范围涉及湖北、重庆、四川部分区域。缪凤林指出,“巴蜀二字,有广狭两义”,狭义巴蜀范围为巴人/巴国、蜀人/蜀国,相当于汉代的巴郡十一县蜀郡十五县及广汉郡十三县;广义巴蜀,还包括了“西南夷”之“西夷”“南夷”即“自今四川全省外,还及西康贵州云南的一部”及汉中郡^[4]。“巴”实包括了中心区与周边区。学者也有巴文化之宏观、微观之分,管维良就宏观巴文化说:“从空间上,凡出有巴文物的地方,或文献记载巴人活动过的地方。”^[5]¹⁵⁵随着考古发现及研究深入,文化之“巴”主要范围以重庆、川东、鄂西为中心,扩及汉中、黔北、湘西,但并不包括廪君后裔——豫州蛮活动的所有区域。

“巴渝”范围虽与“巴”基本一致,但它是随着“巴渝文化”学术概念提出与研究深入而确定的。董其祥于1981年较早提出这一命题^[6]⁴⁴⁰,但作为学术性概念提出是以《巴渝文化》第一辑的正式出版为标志^[7]⁸⁶,该辑“编者的话”提到:“两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川东巴渝之地上,就站立着我们的原始先民。……其后,部落纷争,王国兴衰……乃有今日之川东与重庆。”这表明辑刊探讨的“巴渝”范围是以川东与重庆为主。学者于1999年明确提出了“巴渝文化”概念,“所谓‘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8]“巴渝”演变成了一个中心(重庆)、三个辐射地域(川东、鄂西、湘西)的地理空间。胡道修强调“巴渝”地理概念的变动性,“‘巴渝’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名随人迁的地域概念,随着巴渝区域的主体居住族群的迁徙而变迁,其主体区域有一个由嘉陵江、渠江中游向三峡地区变迁的过程。”^[9]重庆学界关于“巴渝”范围的主流意见则是通过《巴渝文库》第一部书《巴渝文献总目》“凡例”中的“地域范围”体现:古代“以秦汉时期的巴郡、晋《华阳国志》所载‘三巴’为限”,民国“原则上以重庆直辖后的行政区划为基础,根据民国时期的地理建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张弛”^[2]²。

可知,“巴渝”称谓出现较早,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巴人及后裔活动范围不断发展演变的地域概念,范围以今天重庆为中心,包括了川东、鄂西,扩及湘西、黔北。

民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狭义指汉以外的民族,这也是“民族史”书写常用概念。巴地入秦几百年后的汉代,班固追忆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10]¹⁶⁴⁵巴地为“南夷”的认识是基于中心(正统)的观点,再如《宋书》称北魏为“北虏”、《魏书》称刘宋为“岛夷”。与班固“南夷”认识不同,常璩将巴国起源追溯为三皇时期的九州之“一囿”,并为周氏之子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11]⁵,将“巴”排除在蛮夷之外,而蛮夷变成了“其(巴国)属有濮、賨、苴、共、奴、獯、夷蛮之蛮”^[11]⁵¹⁰。本文“巴渝民族”为狭义概念,是历史时期生活在巴渝地域,包括了巴(人)族在内的所有民族。

二、巴渝民族的研究

邓少琴有巴史“新探”“再探”“三探”三论,其中有多篇以“巴族”为题^[12]。而以“族”命名的较早专著应是周集云于1989出版的《巴族史探微》,全书分为丹阳巴人、夷城巴人、巴子国始末、余论四个部分。管维良1996年出版了《巴族史》一书,对巴人从古到唐宋的源流进行了探讨。随后,学界出版了以“重庆”命名的三大民族丛书:“重庆民族丛书”(《重庆民族史》《重庆民族志》《土家族与古代巴人》《重庆民族研究论文选》等),“重庆世居少数民族研究丛书”(“土家族卷”“回族满族卷”“苗族卷”“侗族蒙古族卷”等),“重庆民族乡概况丛书”。三大丛书利用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对重庆民族的古今众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记录。此外,民族史、区域史、(区域)文化史等方面的通史或专门史著作也有论及。就专题性而言,研究成果主要围绕着巴人(巴国)、僚人(南平僚)、土司/土家族等议题展开。

巴人(巴国)、巴(渝)文化研究。《华阳国志》是记录巴人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除校注、单篇文章

外,刘重来、徐适端等还对其“民族的分布与族属”“民族特征”“其他相关记载(巴族地域、经济、文化)”“民族地区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13]。该领域研究的特点在于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的结合,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1)“巴人”起源等问题。争论较大,大致有清江说、汉水说、东夷说、苗蛮说、氏羌说等,也存在二(多)源说,如周集云《巴族史探微》的观点,李绍明濮人与氏羌说^[14],董其祥的江汉巴与清江巴^{[6]13}等。朱圣钟运用大量考古新材料与历史文献互证,对巴人起源及族群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5]。这些探讨涉及迁徙路线、地域、民族成分等问题。争论多,但主流观点都认为“巴人”群体的民族成分非单一。(2)巴(渝)文化问题。学界多次召开了以“巴蜀文化”为题的全国性或区域性学术研讨会,学者对会议情况与目前研究状况有总结,如段渝^[16]、谭继和^[17]、张文^[18]等。杨华专门对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其立足于考古材料,从学术活动、机构、论著、出版物等方面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了“巴文化”从“巴蜀文化”中分离到被接受,再到研究不断深入的学术历程^[19]。此外,学界出版了多部基于考古材料、以“巴文化”为题的学术专著,如《三峡巴文化考古》《巴文化考古研究》《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3)土家族与巴人关系问题。潘光旦于1955年指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一部分后裔^[20]。此后,邓少琴^{[12]86}、李绍明^[21]、杨铭^[22]、雷翔^[23]等众多学者及《土家族研究》(第一辑)^[24]多篇论文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民族学与语言学材料等进行了细致考证,主流观念经历了单纯巴人后裔说到巴人主体说。(4)巴国境内民族研究。巴国境内“有濮、賨、苴、共、奴、獯、夷、蜃之蛮”^[11],童恩正从文献记载、民俗特征等方面对除共、奴外民族的源流问题进行专门探讨,“苴、賨、獯、夷和一部份巴与现代僮傣语族诸民族有关;而蜃与另外一部份巴则为现在苗瑶民族的先民集团之一。”^[25]杨铭结合考古材料对古代重庆濮、僚探讨^[26]。由于民族跨地域性、发展阶段性、称谓泛称性等特征,许多研究并非专论,如何格恩^[27]、邓少琴^[28]、詹坚固^[29]等对蜃族来源、分布、发展演变的讨论。

巴蜀僚人研究。僚的记载,早可追溯到晋人张华《博物志》以及《三国志》卷43《张嶷传》引《益部耆旧传》。巴蜀僚人来源,《华阳国志》载:“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11]僚人力量强大,以致《魏书》等正史皆为其立传,而两《唐书》专门以巴渝“南平”地名设“南平僚传”。僚人对巴蜀影响巨大,唐宋时期的昌州(渝西地区)、渝州仍有僚俗的记载^[30]。关于僚人研究现状,田曙岚^[31]、李艳峰^[32]、杜芝明^[33]、高燃^[34]等先后有撰文;此后,张兢兢^[35]、杨蕙瑜^[36]等对南平僚的发展、演变、华夏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体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巴蜀僚人研究从源流、入蜀影响、史家“僚人”观到华夏化的发展演变。

唐宋是巴渝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重庆民族分布格局的一个转折点,正如《重庆民族史》“序”所说:“唐以前,重庆的居民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37]1}唐宋及后,巴渝少数民族主要聚集于黔、涪、恭一线以南及渝东南区域,“自黔、恭以西至涪、泸、嘉、叙……绵亘数千里,刚夷恶僚殆千万种。”^{[38]考2590}这时期有田氏、向氏、冉氏等大姓与少数羁縻州的少量记载,学者对三大姓发展演变有深入探讨^[39]。原南平僚所在羁縻南州(治綦江北)、溱州(治万盛青年镇),庆历七年(1047)割属渝州。南州于皇祐五年(1053)置南川县(后隶南平军),熙宁开边于溱州地并建南平军(綦江东溪)^{[40]2228},溱州仍为羁縻州,南平军成了“华”边缘。涪州,经大观二年(1108)纳土后变为了省地^{[41]7813},但南宋仍存“夷俗”,“俗有夏、巴、蛮、夷”^{[42]1067}。这说明,南宋时期,巴渝民族在重庆的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僚人为代表的黔、涪、恭一线以北少数民族已华夏化;渝东南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以向氏、冉氏、田氏等有著,故明清在渝东南设有石柱、酉阳宣抚司。

元明清以来,渝、湘、鄂、黔毗邻区域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民族聚居地之一,文献记载及其类别也日益丰富,学界成果丰硕。(1)土司(土家族)研究现状成果丰富,可了解土司(土家族)研究的整体情况,如李绍明^[43]、黄柏权^[44]、贾宵锋^[45]、王希辉^[46]等学者先后撰文,李良品对建国以来西南土司研究的总结^[47],专题性的如莫代山对土家族军事研究的论述^[48]。(2)土司制度(土家族历史)的研究。除《中国土司制度史》《土家族土司简史》《土家族土司兴亡史》《土家族文化史》《土家族医学史》、土家族区域

考古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49]、土家族地区的历史经济地理^[50]等通论性、专题性专著成果外,学者还就某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或某一方面进行探讨,如冉敬林对酉阳土司设置、发展情况的探讨^[51],李良品对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综合探讨和秀山杨土司的个案研究^[52],张万东从机构设置、赋税交纳、朝贡、参与军事征调等方面梳理了渝东南从土司制度建立到清改土归流的发展演变过程^[53],彭福荣探讨了乌江流域的土兵问题^[54],郭声波与刘兴亮对大夏政权在土家族地区行政建置的探讨^[55]。综合运用碑刻、方志、家谱、实录、正史等进行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如黎小龙运用渝黔土家族族谱对大姓土著渊源的考察以及对明末清初渝东南少数民族勘界之争的研究^[56],黄权生利用家谱、碑刻对冉土司抵抗明军事迹进行了考证^[57],高远对三峡博物馆藏木刻《石柱县向氏族谱叙考》的笺释^[58]。

综之,巴渝民族往往被纳入到(西)南方民族体系的整体研究中,即便相对独立的巴人(巴国),也与蜀文化、楚文化等相互影响,这是由民族流动性、分布跨区域性、史料依附性等决定的,也是由历史书写情况、民族称谓内涵、区域观整体性等决定的。巴渝民族研究形成了以巴人(巴国)、僚人、土司(土家族)为重点,其他研究为亮点的格局;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方法,利用正史、族谱、碑刻、方志、实录、器物等进行综合研究,使研究内容得以不断拓展、认识不断突破,这也是巴渝民族研究发展的方向。

三、巴渝民族的文献整理

除《华阳国志》、正史列传以及流传下来的家谱、碑刻等外,巴渝民族史料往往散见于正史、会要、实录、文集、方志等文献中。无论是对巴渝历史的整体了解,还是相关研究便利性,对民族史料的整理意义重大。目前,出土材料整理,主要集中在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的各种发掘简报、考古报告,如常任侠《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物纪略》^[3]、反映三峡考古成果的“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单位”报告丛书;而历史文献的整理大致可分为如下三方面。

1. 以目录、提要等为主的工具书,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巴渝古籍要籍叙录》为提要类,收录了涉及民族资料的《蜀鉴》《吴船录》《蜀中边防记》《广志绎》等^[59];《南方民族古史书录》从著者、版本、内容所在章节三个方面著录了相关书目^[60];《巴渝文献总目》所录条目也涉及部分民族史料,如方志、家谱、碑刻等^[2];《三峡文献举要》为提要类,而以土家族田氏、向氏、覃氏等谱牒的价值较大^[61]。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该书图文并茂,分为书籍类、铭刻类、文书类、讲唱类,具体又包括经卷、史志、谱牒、艺文、碑刻、朝廷文书、地方文书等,如:

田氏宗谱(酉阳)不分卷,1册,86页。清嘉庆十四年(1809)田序宗编纂。酉阳田氏家谱。为立规、兴族、教化而作。是谱载田海世袭六百户,元顺帝命其协助冉如彪领军平服“蛮夷”有功,冉氏奏留,协守插山地、分水岭、山堆沟、渤海坝等地,遂为酉阳土家族大姓之一。对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有参考价值。清嘉庆十四年序第、序宗刻本。楮纸,线装册页装,楷体,墨书。页面41.5cm×26cm,版框28cm×17cm,四周双栏,16行22字。有口题、句读。保存基本完好。今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乡杉树湾村一组田景昌家。(重庆 王心权 彭秀清)^[62]³⁰

2. 方志整理出版。任乃强、刘琳均对《华阳国志》作过整理、校注,是学界常使用的重要资料;李勇先等整理的《华阳国志珍本汇刊》《华阳国志汇刊续编》将历代重要版本、辑佚校勘成果加以汇编影印分别于2014,2018年出版。渝鄂湘黔毗邻地区的珍稀方志,或入方志集成,或单独整理出版,如巴蜀书社于2009,2010,2012年先后出版了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乾隆《酉阳州志》《彭水珍稀地方志史料汇编》;而道光《补辑石柱厅新志》、光绪《秀山县志》、光绪《黔江县志》等被纳入到巴蜀书社1992年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中。方志辑录方面,如《永乐大典》方志史料中关于绍庆府(黔州)资料的辑录^[63],湖

南地方志中少数民族史料的辑录^[64]等。

3. 史料的辑录(汇编)。正史民族资料的辑录,如《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除元明清土司制度材料外,还包括“羁縻政策”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史料^[65],再如潘光旦先生对《明史》民族史料的辑录中将巴渝民族辑录于“巴”“土家”条目之下^[66];重要民族人物资料的整理,如《秦良玉史料集成》涉及正史、稗史、方志、家乘、族谱、石刻碑帖、评论诗文及流传较广而价值较高的口碑资料等,资料包括讨杨应龙、受命土司官、援辽、平奢等七部分内容^[67];土司资料的整理,如《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续编》,其包括奏章、文诰、传记、碑刻等重要史料^[68];综合性资料整理中也涉及大量民族史料,如蓝勇主编的《四库全书中的重庆史料选辑》(未刊版)。

这些史料中,有四部比较重要:(1)《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九集《土家族》^[69],汇编包括“土家族恢复民族成份情况及人口分布”“社会调查”“文物文献碑文”“族谱”等内容,但史料多以渝黔交接土家族为主。(2)《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记录了史、志、谱、碑文等方面关于土、苗、侗等少数民族在民族源流、羁縻州郡时期、土司制度时期、改土归流以及经济、风俗等方面的史料^[70]。(3)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从1989至1994先后出版了土司史录、溪州铜柱铭文考释等七部土家族古籍丛书,如《史录》辑录了正史、族谱、方志、实录等文献中关于湘鄂渝黔等地土司沿革、政治、经济、文化、改土归流等方面的史料^[71]。(4)川东南民族史料的整理有两部:《川东南民族资料汇编》“编印说明”载:汇编分为经济、文艺、人物、民俗、历史、地理等分册,但笔者只见“文艺”册,辑录了酉阳、石柱土家族文人文学资料^[72];《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73]分为正史、别史、杂史、地理志、实录、地方志、谱牒、碑志、附录(调查报告)等目,有两个特点:一是因民族活动的跨区域性,史料不局限川东南地区,所以也酌情收录一些相关区域的资料,如嘉靖《思南府志》、乾隆/民国《贵州通志》、道光《印江县志》《省溪杨氏土司世系源流》等;二是收集了部分宝贵的谱牒与碑刻资料,如《冉氏家谱》《酉阳南界土门村冉姓碑》等。

综之,巴渝民族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族谱、碑刻、文书等史料的综合运用还有潜力可挖;资料整理性质的“汇编”,多偏重某一类或某一区域,而以历史为跨度、以巴渝地域为空间、以巴渝民族源流发展演变为对象的史料整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如族谱、碑刻类史料的整理,档案文书类资料的整理,文献中散见民族史料(如文集、人物传)的整理等。

[参 考 文 献]

- [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任竞,王志昆主编.巴渝文献总目·总序[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 [3] 卫聚贤.巴蜀文化[J].说文月刊,1941(4).
- [4] 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J].说文月刊,1942(7).
- [5] 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编.巴渝文化(第三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6] 董其祥.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7] 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编辑.巴渝文化(第一辑)[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8] 刘豫川,杨明(铭).巴渝文化[J].重庆历史与文化,1999(1).
- [9] 胡道修.巴渝的内涵与巴渝文化的本源探究[J].长江文明,2009(总第3辑).
-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1]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2]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13] 刘重来,徐适端.《华阳国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
- [14] 李绍明.川东南土家与巴国南境问题[J].思想战线,1985(6).
- [15] 朱圣钟.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 [16] 段渝(文玉). 巴蜀文化研究概述[J]. 中华文化论坛,1994(1);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J]. 中华文化论坛,2003(3);“巴蜀文化”研究发轫[J]. 史学史研究,2007(4).
- [17] 谭继和. 巴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J]. 四川文物,2002(2).
- [18] 张文,王兴刚. “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J]. 学术月刊,2004(6).
- [19] 杨华. 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J]. 三峡文化研究,2015(11).
- [20] 潘光旦. 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 [21] 李绍明. 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J]. 云南社会科学,1990(3);李绍明. 川东西水土家[M].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 [22] 杨铭. 土家族与古代巴人[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 [23] 雷翔. 民族自我意识与“祖先认同”建构—以土家族祖先认同中的“巴人”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0(6).
- [24] 贵州土家学研究会编. 土家族研究(第一集)[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 [25] 童恩正. 古代巴境内民族考[J]. 思想战线,1979(4).
- [26] 杨铭. 论古代重庆地区的濮、僚族[J].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5(4).
- [27] 何格恩. 蜑族的来源质疑[J]. 岭南学报,1936(5).
- [28] 邓少琴. 邓少琴遗文辑存[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29] 詹坚固. 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J]. 民族研究,2012(1).
- [30]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1] 田曙岚. “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J].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8),1981.
- [32] 李艳峰,王兴宇. 中国古代僚人研究回顾和反思[J]. 思想战线,2012(6).
- [33] 杜芝明. 僚人研究述略[J]. 长江文明,2014(第15辑).
- [34] 高然,杨鑫. 建国以来的巴蜀僚人研究[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6).
- [35] 张兢兢. 南朝巴蜀僚人的华夏化[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2).
- [36] 杨蕙瑜. 唐代僚人研究—以唐政权与僚人群体关系研究为中心[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 [37] 管维良. 重庆民族史·序[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 [38]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9] 杨明(铭). 南北朝至宋重庆地区的蛮系民族—向氏、田氏、冉氏研究[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2).
- [40]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1] 徐松辑. 宋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42] 祝穆. 方輿胜览[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43] 李绍明. 川渝土家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民族大家庭,1997(6).
- [44] 黄柏权. 土家族族源研究综论[J]. 贵州民族研究,1999(2).
- [45] 贾宵锋. 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4).
- [46] 王希辉. 近十年国内土家族研究综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8).
- [47] 李良品.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综述[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
- [48] 莫代山. 土家族军事研究综述[J]. 铜仁学院学报,2008(1).
- [49] 邓辉. 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2002.
- [50] 朱圣钟. 鄂湘渝黔土家族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
- [51] 冉敬林. 酉阳土司制度述略/明代酉阳土司制度特点[J]. 贵州文史丛刊,1994(5),1995(4).
- [52] 李良品.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1(3);关于秀山杨氏土司的几个问题[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9(2).
- [53] 张万东. 明清王朝对渝东南土司统治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6.
- [54] 彭福荣.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土兵探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3).
- [55] 郭声波,刘兴亮. 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
- [56] 黎小龙等主编. 南方民族史论集[C].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黎小龙. 从《复镇夷乡碑记》看明玉珍大夏

政权与明清黔西之争[J]. 长江文明, 2017(第 28 辑).

[57] 黄权生. 巫山冉氏抗明考[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3(4).

[58] 高远.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木刻《石柱县向氏族谱叙考》笺释[J]. 长江文明, 2016(第 24 辑).

[59] 薛新力. 巴渝古代要籍叙录[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60] 吕名中. 南方民族古史书录[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

[61] 黎小龙, 龚义龙. 三峡文献举要[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8.

[6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63] 马蓉, 陈抗等点校.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64]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上下)[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1, 1992.

[65] 李良品等. 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66] 潘光旦. 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明史》<之部[M]. 北京: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67] 秦良玉史研究编撰委员会. 秦良玉史资料集成[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68] 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等. 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续编[M]. 鹤峰县印刷厂等, 1984, 1993.

[69] 陈国安. 民族志资料汇编·土家族[M]. 贵州省民族志编委会编, 1989.

[70] 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M]. 鹤峰县国营民族印刷厂, 1986.

[71] 王承尧等辑. 土家族土司史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1.

[72] 四川省涪陵地区川东南民族资料编辑委员会. 川东南民族资料汇编·文艺[M]. 涪陵: 涪陵《群众报》印刷厂, 1986.

[73] 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A Summary of the Ethnic Studies and the Documents Arrangement in Bayu

Du Zhiming

(Chongqi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China)

Abstract: The Bayu ethnic minor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s in the study of Bayu's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mainly focus on the Ba people (Ba State) and culture, the people of Lao, the Tusi (Tujia minority) in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tc. It involves national origin, national governance, national ideology, national culture, national geography and so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regional nature of ethnic groups, the documents scattered and mainly attached to national biographies (entries) determine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the docum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cross-regional and Ba-Yu areas (southeastern Chongqing), comprehensive and thematic.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bibliographic and summary-based reference books;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official history, factual records, geographical records, genealogy, local chronicles, inscriptions and so on.

Keywords: Bayu area; ethnic studies;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责任编辑: 刘力]